

# “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媒体的“帝国”意象<sup>\*</sup>

白云天

**摘 要：**20 世纪上半叶，面对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美国媒体，结合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将“泛阿拉伯主义”附会到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进而视其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纳赛尔掌权后，美国媒体出于对埃及亲苏外交的敌视，纷纷指责埃及政府试图仰仗苏联支持，建立“阿拉伯帝国”。随着埃及（阿联）与苏联之间矛盾的加剧，美国舆论界仍继续敌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认为纳赛尔建立“阿拉伯帝国”的“野心”虽然导致其与苏联的纷争，但仍是西方的威胁。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敌视，虽然伴有强烈的冷战心态，但他们频繁以“阿拉伯帝国”或“穆斯林帝国”的历史意象，比附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对“东西对立”叙事模式的延续，反映出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对“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并连带着对中东地区整合倾向的担忧。

**关键词：**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帝国”；历史记忆；美阿关系；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白云天，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珠海 519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2-0137-2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斯兰教视域下的宗教对话资料整理与研究”（18ZDA234）的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

在英文语境中,“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经常与“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阿拉伯统一”(Arab Unity)混用,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与后两者不同,“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在阿拉伯语中没有固定的对应词,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正面色彩存在较大反差。1958年7月,面对纳赛尔政权在阿拉伯世界的鼎盛之势,美国朝野一部分人刻意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相区分。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认为,美国可以与中东的“民族主义”和解,但具有反西方、反以色列色彩的“泛阿拉伯主义”却是苏联所支持的“破坏性图谋”。<sup>①</sup>同年8月,美国共和党人马丁·大卫(Martin David)在《纽约先驱报》上撰文指出,“民族主义者”是维护本国的“自由”,致力于“人民福祉”,且“尊重本国与别国的关系”;而致力于“统一所有阿拉伯人”的“泛阿拉伯主义”,却使人回想起19世纪沙俄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大卫看来,纳赛尔试图创建的“泛阿拉伯统一”(a pan-Arab union)可能为苏联所利用。<sup>②</sup>可见,在部分美国政客的描述下,与“阿拉伯统一”理念密切相关的“泛阿拉伯主义”一词,被区别于“民族主义”,承受着污名化,甚至还被扣上了“亲苏”的帽子。的确,冷战时期的美国在应对中东问题时,时刻都在考虑如何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美国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偏见,并非始于冷战时期。即便在二战结束前的20年里,苏联(苏俄)的影响力尚未明显扩散到阿拉伯地区,但面对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美国媒体已开始渲染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恐惧,将其联系到穆斯林与基督徒对抗的“历史记忆”中。纳赛尔崛起后,美国舆论在指责他推动“泛阿拉伯主义”时仍连带着“东西对立”的历史记忆,将纳赛尔号召的“阿拉伯统一”比附为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和“穆斯林帝国”,将其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夹带着浓厚的东方主义偏见。即便埃及(阿联)与苏联的矛盾加剧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延续了此前对纳赛尔政权的印象,仍将其推行的“泛阿拉伯主义”视为历史上东方帝国的延续。

关于美国如何应对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冷战、石油、以色列等现实主义因素,从政府层面探讨美国与埃及(阿联)的关系。也有研

---

<sup>①</sup>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Vol. 12, July 20, 1958, p. 83.

<sup>②</sup> David Martin, “Nasser No Nationalis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ugust 2, 1958.

究从舆论或文化层面入手,但最终落于美国人对冷战的关注。萨利姆·雅库布(Salim Yaqub)强调,美国与纳赛尔政权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利益之争而非文化层面的冲突。<sup>①</sup>这种现实主义的思维模式忽视了文化与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的微妙作用。任何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直接的来源是彼此间的敌意,即互相之间的负面认知,但这种负面认知未必总是来自现实利益的冲突。相反,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认同有时还能缓解利益分歧,反之也可能加剧这种冲突。正因如此,凭借对所谓“自由世界”的认同,美国与法国、日本、德国、英国之间虽有利益冲突,但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至于决裂。同理,土耳其之所以长期被排斥在欧盟之外,主要在于土耳其在宗教与文化层面与西方世界的差异使其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充分认同。考虑到美国的国情,探讨美国对于“泛阿拉伯主义”乃至一切地区整合主义的反应,不应局限在政界人士的言行,还应重视那些长期主导美国社会舆论的文化理念。

本文以一战后“阿拉伯帝国”这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历史意象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传播为线索,通过梳理“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舆论中的污名化,探索美国敌视中东地区整合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进而为把握今后美国如何应对“新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等其他地区整合主义,提供一种基于历史的分析。

## 二、“东西对立”史观与泛阿拉伯主义的污名化

1916年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掀起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被普遍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在此后的历史叙事中,阿

---

<sup>①</sup>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and the Middle E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p. 8-22, 271; Douglas Little,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pp. 157-192; Richard J. McAlexander, “Couscous Mussolini: US Perceptions of Gamal Abdel Nasser, the 1958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Israeli Special Relationship,”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3, August 2011, pp. 363-385; Rian T. Bobal, “‘A Puppet, Even Though He Probably Doesn’t Know So’: Racial Identity and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Encounter with Gamal Abdel Nasser and the 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 5, 2013, pp. 943-974; [埃及]阿里丁·希莱尔:《美国与阿拉伯统一:1945~1982》(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88-100页; Malik Muf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sserist Pan-Arabism,” in David W. Lesch, e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67-168, 182; Peter L. Hahn, *Missions Accomplish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 Since World War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7;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哈勒:《美国对阿拉伯统一的态度(1918~2008)》(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14年版,第137-161页。

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存在本质差异,<sup>①</sup>但当时西方舆论界,并没有严格区分这种差异。1917 年 2 月,《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就强调谢里夫侯赛因的“圣裔”身份,认为他立志恢复伊斯兰教在“政教帝国”(religio-political empire)时代的荣光,指出他所占据的汉志地区因坐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而成为“大伊斯兰教帝国(great Mohammedan empire)的核心”。文章作者并没有对伊斯兰教及侯赛因表现出明显的偏见与敌意<sup>②</sup>,但他强调哈希姆家族作为圣裔而具备的伊斯兰教属性,实际上已将其推向了“他者”范畴。考虑到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盛行的反伊斯兰史观,这篇文章对哈希姆家族的这种身份界定,就预示了后来的东方主义偏见。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即是明证。

1919 年 2 月,参加巴黎和会的汉志王国代表费萨尔王子,试图在“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下取得对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sup>③</sup>但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两国并没有尊重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反而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东部地区分割并置于英法的“委任统治”之下。对此,出席过巴黎和会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认为:“基督教世界世代代敌视伊斯兰教(Mahomeddan faith)……巴黎和会的大部欧洲代表都执意反对将奥斯曼苏丹过去的领土交还给穆斯林统治……敌视穆斯林的氛 围使得费萨尔王子难以创建新的叙利亚王国,因为它将会是另一个穆斯林王国。”<sup>④</sup>兰辛的描述被伊拉克学者阿里·阿拉维概括为“西方列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根深蒂固的偏见”<sup>⑤</sup>。此类偏见并不局限于欧洲,同样活跃于美国媒体的各类报道中。当时,美籍匈牙利人尤金·巴格尔(Eugene S. Bagger)就放眼于“东西方三千年斗争史”,认为奥斯曼帝国未被允许参加巴黎和会是“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胜利”,欢呼“亚洲被驱逐出欧洲”。<sup>⑥</sup>虽然巴格尔当时并没有攻讦阿拉伯人,但奥斯曼人已被划入与“西方”为敌的“东方”。按照这样的逻辑,同样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阿拉伯人,一旦违背“西

①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讨论,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与彼得·维恩(Peter Wien)做出过概括与总结。参见 Rashid Khalidi, “Arab Nationalism: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Literature,” pp. 1363–1373; Peter Wien, *Arab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9–15.

② “Mohammad’s Descendant on Prophet’s Thron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1917.

③ 当时的“叙利亚”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土耳其南部部分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

④ Robert Lansing, *The Big Four and Othe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pp. 170–171.

⑤ 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05.

⑥ Eugene S. Bag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New-York Tribune*, June 08, 1919.

方”的利益和价值观,也很容易会被美国人视为异己。

当时美国社会对“阿拉伯人”的身份界定尚处于模糊状态,这也使得阿拉伯统一运动在美国舆论中饱受诟病,并被赋予了地区扩张主义的色彩。在巴黎和会期间,哈佛大学博士伊瑟亚·约瑟夫(Isya Joseph)曾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指出“叙利亚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并非阿拉伯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而言,他们都“拥有较高层次的文明”,他们一旦加入“阿拉比亚”(Arabia),无法取得经济和教育上的好处。他还指责“汉志人”在宗教上“尤为狭隘”,其他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乃至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都缺乏“西方制度中所蕴含的政治公正与宗教宽容精神”。<sup>①</sup>可见,约瑟夫在看待中东各民族时,带有强烈的西方优越感,这也是日后美国人非议阿拉伯统一运动所秉持的自负心态。

此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地区,难免处在混乱与冲突的状态中。这就为美国的东方主义偏见提供了材料。1919年3月13日,查尔斯·塞尔登(Charles A. Selde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责“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谷掀起排外运动,杀戮欧洲人”,还渲染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遭到“阿拉伯暴徒”的攻击。塞尔登进而认为,“现在的泛阿拉伯运动是阿拉伯人沿着土耳其人的老路,迫害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他民族”。这或许是“泛阿拉伯”字样在美国遭遇污名化的开始。塞尔登还指责在巴黎和会上“看似温和”的费萨尔王子实则“野心勃勃,试图统治整个小亚细亚地区”。<sup>②</sup>3月14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泛阿拉伯者”的短文,文章称“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sup>③</sup>带有明显的排外色彩。

1920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菲利普·布朗(Philip Marshall Brown)在《纽约先驱报》撰文指出,在“亚细亚团结”(Asiatic solidarity)因素的作用下,“叙利亚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Mahometan Arabs)非常愿意联合起来对抗欧洲人,甚至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也可能搁置矛盾,按照“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Asia for the Asiatica)这一模式团结起来。<sup>④</sup>可见,即便在亚洲与欧洲对立的叙事模式下,阿拉伯人仍被赋予“他者”身份,更何况布朗并没有放松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恐惧心态。与后来的世俗主义形象不同,当时的凯末尔虽已在安卡拉自立

<sup>①</sup> Isya Joseph, "Mesopotamia and Arabi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19.

<sup>②</sup> Charles A. Selden, "Arabs' Aspirations Menace Asia Minor: Recent Riots and Massacres of Christians in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19.

<sup>③</sup> "Pan-Arabien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19.

<sup>④</sup> Eugene S. Bagger, "Is the World to See a Revival of the Arabian Empire," *New-York Tribune*, April 18, 1920.

门户,但他仍在名义上尊奉奥斯曼帝国,甚至高举伊斯兰教的大旗,号召人们抵抗协约国和希腊的侵略,这使其一度得到部分中东国家乃至印度穆斯林的青睐。<sup>①</sup> 对此,菲利普·布朗认为,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正在推动“泛伊斯兰运动”,试图将通过“穆斯林反欧团结”(Moslem anti-European solidary),将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团结起来。<sup>②</sup> 这种认识进一步将阿拉伯人与反西方的泛伊斯兰运动联系起来。《纽约先驱报》在同年 7 月刊登的一篇报道中称“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正在各地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希腊人交战”,渲染巴勒斯坦、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等地的“宗教狂热”(religious ferment),指责“穆斯林正在屠杀或驱逐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sup>③</sup>

1923 年 8 月,英国前驻苏丹高级专员巴克斯特(D. D. Baxter)在《洛杉矶时报》撰文。他根据对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记忆,认为伊斯兰教的整合作用构成了“阿拉伯人对文明的威胁”。<sup>④</sup> 虽然这是英国人的声音,但却在日后得到了相当一批美国人的呼应。十多年后的一则“反例”便说明了这点。1936 年 4 月,生活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卡提巴(H. I. Katibah)在《纽约时报》撰文,认为“阿拉伯统一”具有一定的前景和基础,强调“泛阿拉伯主义”对基督徒的友善及其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区别。<sup>⑤</sup> 卡提布的辩护,恰恰反映了美国舆论在宗教上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恐惧与敌视。

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得巴勒斯坦局势愈发动荡。在此背景下,一些美国人乘势渲染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惧。1936 年 12 月,美国学者麦考恩(C. C. McCown)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从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指责阿拉伯人“愈发喜欢叛乱与暴力”,声称“七千万阿拉伯人和二亿五千万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关注……使得巴勒斯坦正被一个阿拉伯帝国(an Arabic empire)所包围”。<sup>⑥</sup> 1938 年 9 月,《华盛顿邮报》在刊载雅各布·西蒙(Jacob Simon)的文章时附加了一段带有立场的“编者按”:“当前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挑起的血腥冲突,已经导致圣地数千人的伤亡”,这句“编者按”旨在为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开脱,主观色彩十分明显。西蒙认为,受英国支持了 30 年的“泛阿拉伯主义”如今却在巴勒斯坦令英国“自作自受”,因为“泛伊斯兰运动”此时已被“泛阿拉

① Mona Hassan, *Longing for the Lost Caliph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2-159.

② Eugene S. Bagger, “Is the World to See a Revival of the Arabian Empire”.

③ “War Rages in All Parts of Turk Empire,” *New-York Tribune*, July 19, 1920.

④ D. D. Baxter, “Will the Unconquered Arab Hordes Overrun Worl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2, 1923.

⑤ H. I. Katibah, “Arab Unity Idea Gain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36.

⑥ “Palestine Threatened with New Arab Revolt,”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6, 1936.

伯领导人”用来恐吓英国。<sup>①</sup>

与此同时,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也在渲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并连带着对阿拉伯人的批判。1939年7月,美国著名的“科学种族主义者”洛特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他结合历史上穆斯林的“圣战”,将全球穆斯林的“宗教团结”视为对欧洲的传统威胁。为此,斯托达德称赞近20年来欧洲的“民族”(nationality)观念正在消弭“穆斯林世界的历史性团结”,认为伊斯兰世界会沿着当年欧洲的道路,演变为一系列“世俗化且拥有绝对主权的民族国家”。但他认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中只有土耳其符合西方标准,因为凯末尔使得“世俗爱国主义(secular patriotism)取代了传统的宗教面貌”。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斯托达德认为其尚处在“初级阶段”,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阿拉伯人的“新爱国主义(new patriotism)混杂着古老的宗教观念”,而北非的民族主义更是“泛伊斯兰民族主义”。<sup>②</sup>虽然斯托达德没有在文中直接评论“泛阿拉伯主义”,但根据其对伊斯兰教统合观念的敌视与恐惧,他应该也不愿意看到带有“古老宗教观念”的阿拉伯人统一起来。

当然,受“民族自决”理念的影响,也有一部分美国人对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表现出一定的同情。1937年7月,《纽约时报》刊文指出,“重视泛阿拉伯主义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人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威胁西方的利益;另一类人信奉伍德罗·威尔逊的理念,认为应该让弱小民族实现自治”<sup>③</sup>。但是,即便同情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人也往往对作为“他者”的阿拉伯人带有种种猜忌,因而呼吁以西方的理念规训阿拉伯人的统一运动,刻意区别于“泛阿拉伯主义”。

1942年6月,《芝加哥每日论坛》刊登牛津大学著名东方学学者汉密尔顿·吉本(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 Gibb)在芝加哥大学的讲话。吉本认为,“绝对的政治统一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民族主义者接受地区政治组织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而泛阿拉伯主义者不同于民族主义者,想要政治上的统一。泛阿拉伯主义是一股无知、缺乏包容的爆炸性势力……不仅仇视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实践和理念,还渴望将欧洲人和犹太人赶入大海……泛阿拉伯主义不关心治理问题……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贫穷”<sup>④</sup>。这位英国学者对“泛阿拉伯主义”的

① Jacob Simon, “The Arabs Reunit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5, 1938.

② Lothrop Stoddard, “The Wide Horizon: Nationalism in Islam,”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7, 1939.

③ Joseph M. Levy, “Arab Unity is Still Remot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8, 1937

④ “Federation Plan Termed Key to Unity for Arabs,” *Chicago Daily Tribune*, June 27, 1942.

污名化表述,在 16 年后又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财长安德森等高官所复述。<sup>①</sup>

无独有偶,1943 年 10 月,美国历史学家卡乔尔·迈克尔(Joel Carmichael)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只有统一才能让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成长起来,才能使他们走出战争的残骸。”但他憧憬的“近东联邦”(Near Eastern Federation)是要维持各国的“内部自治”,因为这是“最切实际的”。至于“泛阿拉伯主义者”所憧憬的“阿拉伯帝国”,在他看来则是“极端”且“虚妄的”(chimerical),而且敌视“异教徒”。<sup>②</sup>

可见,吉本和卡迈克尔竭力渲染“泛阿拉伯主义”的排外特征,否定其建设性功能,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进而区别于他们为阿拉伯人安排的“统一”。他们对“阿拉伯统一”的理解与包容,只是接受各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这种看法与当时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立场非常接近。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政府就表示不赞成政治上的阿拉伯统一。至杜鲁门时代,美国国务院更是明确警告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切勿以武力手段吞并叙利亚。<sup>③</sup>

吉本与卡迈克尔的立场与 1945 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非常接近。但保留各阿拉伯国家“主权”与“独立”的阿盟,并没有满足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无论是哈希姆王朝坚持的“肥沃新月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还是纳赛尔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大力倡导的阿拉伯统一计划,都折射出“统一”理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望,但也预示着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与美国舆论的冲突。

### 三、冷战背景下“东西对立”史观的延续

1952 年“七月革命”后,埃及革命政权起初给美国人留下了良好印象,但因纳赛尔在 1955 年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购置苏联武器,流露出明显的亲苏倾向,使得美国舆论对其看法迅速恶化。<sup>④</sup> 此外,埃及对待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承认新中国以

<sup>①</sup>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 13, July 25, 1958, pp. 464-465;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74<sup>th</sup>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Vol. 12, p. 130.

<sup>②</sup> Joel Carmichael, “Notes on Arab 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22, No. 1, October 1943, pp. 148-153.

<sup>③</sup> [埃及]阿里丁·希莱尔:《大国和阿拉伯统一:1915~2015》(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2017 年版,第 63 页。

<sup>④</sup> Richard J. McAlexander, “Couscous Mussolini,” pp. 367-370.

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措施,都招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敌视,进而导致美埃关系迅速恶化。

有学者曾指出,美国媒体之所以愿意以墨索里尼、希特勒比附纳赛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着西装且出身平民的纳赛尔并不适合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sup>①</sup>但这并不妨碍美国舆论将纳赛尔塑造成一位赤面獠牙的“他者”,且连带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记忆。当然,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纳赛尔往往被视为世俗主义的化身。对此,美国人是有所认识的。<sup>②</sup>但阿拉伯民族主义毕竟与伊斯兰教有着渊源,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共通性。纳赛尔的世俗主义色彩,并不代表他是反伊斯兰教的。相反,他努力塑造自己虔诚的穆斯林形象,积极利用伊斯兰教的资源。<sup>③</sup>因此,在“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下,对抗西方列强的纳赛尔还是让美国人想起了当年对抗基督教世界的“阿拉伯帝国”。

1956年3月,在埃及与西方列强剑拔弩张之际,长期报道中东问题的美国知名记者奥古德·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埃及试图打造阿拉伯帝国”的文章,称纳赛尔正在打造“新的阿拉伯集团”以对抗“西方三大国”(英美法)和以色列。卡拉瑟斯认为,纳赛尔试图通过这个阿拉伯集团“在中东创建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大国”。虽然卡拉瑟斯强调苏联对纳赛尔的军事援助,但认为纳赛尔新组建的阿拉伯集团“也是反共的,正如它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一样”。<sup>④</sup>7月,《波士顿环球日报》刊文称,“近百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游荡在以色列周围,将他(纳赛尔)视为20世纪的萨拉丁,他将统一穆斯林世界,把可恶的以色列国家赶入大海”<sup>⑤</sup>。作为十字军的劲敌,萨拉丁作为一个符号,被赋予了过多的现实色彩。在纳赛尔建构的历史记忆中,萨拉丁是领导阿拉伯人对抗欧洲侵略的民族主义英雄。<sup>⑥</sup>但对于西方而言,萨拉丁虽然具备人格魅力,

① Richard J. McAlexander, “Couscous Mussolini,” p. 364.

② “Complex of Arab Nationalism: The Compound Includes Frustration, Anti-Western and a Her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7, 1958; John S. Badeau, “Islam and the Modern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38, No. 1, October 1959, pp. 67-68.

③ Fawaz A. Gerges, *Making the Arab World: Nasser, Qutb, and the Clash that Shaped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94-198.

④ Osgood Caruthers, “Egypt Tries to Mold Arab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56.

⑤ Wilton Wynn, “Nasser Hero to Arabs - Outside Egypt,” *Daily Boston Globe*, July 8, 1956.

⑥ Malek Khouri, *The Arab National Project in Youssef Chahine's Cinema*,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0, pp. 45-47; Omar Sayfo, “From Kurdish Sultan to Pan-Arab Champion and Muslim Hero: The Evolution of the Saladin Myth in Popular Arab 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50, No. 1, 2017, p. 76; Peter Wien, *Arab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46-47.

但却让人回想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史。

此外,纳赛尔著名的小册子《革命哲学》不但呼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也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团结,这也激起一些美国人负面的历史记忆。对此,有人于 1956 年 8 月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认为《革命哲学》反映出纳赛尔“正在寻求一个阿拉伯—非洲帝国”,指责纳赛尔“到处支持极端主义者对付理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非洲人不一定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也不邀请埃及的干涉”。<sup>①</sup> 作者通过强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将纳赛尔塑造成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者。9 月,针对纳赛尔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及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卫士日报》刊文称“纳赛尔想要的不仅仅是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帝国”,还想让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主导整个非洲的命运,并且“要让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可见,纳赛尔的“阿拉伯帝国”不但扮演着与西方对立的角色,还延续着伊斯兰教与西方相对抗的叙事逻辑与历史记忆。<sup>②</sup> 当然,也有媒体作家为纳赛尔辩护。当时兼任“世界伊斯兰会议”秘书长的萨达特发表了调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言论。对此,美国报道中东问题的著名记者爱德华·西罕(Edward R. F. Sheehan)称赞纳赛尔“正在努力去去除伊斯兰教中恶劣的封建传统”<sup>③</sup>。但西恩的肯定,恰恰是因为他觉得埃及领导人正在按照西方标准的“现代化”理念改变伊斯兰教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折射出他对伊斯兰教的担忧与恐惧。

1957 年 4 月,约旦政局陷入动荡,一度危及侯赛因国王的地位。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纳赛尔参与其中。《纽约先驱论坛》报道称“亲苏的”纳赛尔试图与约旦、叙利亚组建“联邦”(federation),以成立“阿拉伯联合帝国”(United Arab Empire)。<sup>④</sup> 《波士顿环球日报》刊文认为,纳赛尔在“其他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的大众及暴民中,享有广泛的支持”,并援引“一位在中东的西方学生”的话称“他们至少将他(纳赛尔)当作了萨拉丁”。对此,文章作者巴勒特·麦克古恩(Barrett McGurn)对萨拉丁做了简要的介绍,即“一位 12 世纪的英雄,将基督教十字军赶到了巴勒斯坦的狭长滩地,这些十字军最终在那被消灭殆尽”。用萨拉丁比附纳赛尔,离不开后者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但这在麦克古恩看来却是“极端主义”。<sup>⑤</sup>

① Judd L. Teller, “Nasser’s Aim Outlined,”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956.

② Howard Handleman, “Gamal Abdel Nasser ... The Kind of World He Wants Visions a Vast Arabic Empire,” *Daily Defender*, September 5, 1956.

③ Edward R. F. Sheehan, “Seeks to Use Religion as Tool for Realizing Political Plans; Nasser Dreams Moslem Empire,” *Daily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1, 1956.

④ Barret McGurn, “Nasser Plan for Arabs Is Set Back; Dream of Empire Appears Remot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pril 16, 1957.

⑤ Barrett McGurn, “Nasser Slipping?,” *Daily Boston Globe*, May 1, 1957.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吞并叙利亚”这一令哈希姆王朝苦心孤诣40年都未实现的愿望,却被刚满40岁的纳赛尔实现了。这在美国舆论界引发了强烈反响,“阿拉伯帝国”的幽灵在美国媒体作家的笔下愈发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虽已经充分认识到开罗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sup>①</sup>,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纳赛尔亲苏的印象仍根深蒂固,认为他试图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就是苏联的马前卒。<sup>②</sup>如此,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惧记忆就与美国的冷战焦虑结合在了一起。2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纳赛尔之“大构想”》的文章。文章认为埃叙合并标志着纳赛尔建立“泛阿拉伯帝国”(a pan-Arab empire)的野心更加膨胀,而这个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帝国一旦建立,将控制西欧的命脉—石油。<sup>③</sup>卡拉瑟斯认为纳赛尔在成为阿联总统后“马上就会收拾那些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藐视其领导权的人”,苏丹就可能成为他“扩张帝国”的下一个目标。<sup>④</sup>5月,黎巴嫩国内冲突加剧,内战一触即发。亲西方的黎巴嫩总统夏蒙指责纳赛尔支持黎巴嫩反对派,这加剧了西方世界对纳赛尔的敌视。5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开罗轴心”的文章,宣称赫鲁晓夫已经承诺帮助纳赛尔“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在泛阿拉伯帝国之中”<sup>⑤</sup>。

7月14日,巴格达爆发政变,亲西方的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覆灭。受此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夏蒙的请求下,于当日出兵黎巴嫩。7月16日,约瑟夫·哈施(Joseph C. Harsch)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指出,纳赛尔拒绝接受美国“投身西方社会”的劝告,而是“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实际统治者”,认为纳赛尔“已经成功将叙利亚和也门囊括进自己的帝国……马上就要创建新的开罗哈里发国”,如果美英不出兵介入黎巴嫩和约旦,便只能默认“纳赛尔的帝国”。哈施使用的“哈里发国”一词,充分体现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记忆。他还认为,莫斯科会对中东“乱局”幸灾乐祸。<sup>⑥</sup>8月,有人致信《纽约时报》编辑

①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and the Middle East*, pp. 189-192;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哈勒:《美国对阿拉伯统一的态度(1918~2008)》(阿拉伯文),第329-337页;[伊拉克]阿里·萨利赫·哈马丹·哈米德:《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从独立到阿以战争(1946~1967)》(阿拉伯文),载《历史研究期刊》2014年第2期,第149页。

② “The Arab Republic,”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3, 1958; “Nasser’s Syria Grab Called Soviet Coup for Oil Control,”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5, 1958; “Nasser’s Dream: Vast Oil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58.

③ “Nasser’s ‘Grand Desig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58.

④ Osgood Caruthers, “Nasser Ambition Now to Extend His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58.

⑤ “Moscow-Cairo Axi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58.

⑥ Joseph C. Harsch, “State of the Nations: U. 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6, 1958.

部,为美国政府出兵黎巴嫩辩护,认为纳赛尔在其《革命哲学》中已经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即“一个由开罗主导,囊括整个非洲及中东的穆斯林帝国”,并试图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sup>①</sup>

当时正值美苏关系颇为紧张之际,加之开罗与莫斯科的关系尚好,中东地区弥漫着冷战气氛。因此,美国媒体在控诉纳赛尔试图建立“阿拉伯帝国”时,往往联系到开罗的亲苏外交。但是,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惧与渲染,在美国舆论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只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才与美国人的冷战焦虑出现偶合,而非始自纳赛尔的亲苏外交。而且在上述案例中,也并非所有人都将“阿拉伯帝国”与苏联的扩张相联系。即便日后纳赛尔的反苏倾向愈发明显,美国与阿联的关系出现明显改善,但只要纳赛尔没有彻底放弃美国人眼中的“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帝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 四、超越冷战的东方主义偏见

虽然埃及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奉行亲苏的外交路线,但埃及(阿联)与苏联的合作终究是互相利用。奉行“积极中立”与不结盟政策的纳赛尔,非但不希望埃及本国过于依赖苏联,也难以容忍莫斯科过分染指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阿拉伯国家。1957 年的叙利亚危机,曾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充分感受到纳赛尔对苏联染指叙利亚的警惕。1958 年初,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更是让美国官员充分认识到开罗与莫斯科的矛盾。但这种潜在矛盾随后就被纳赛尔访苏、黎巴嫩危机及伊拉克政变所掩盖。但从 1958 年末开始,伊拉克革命政权的内斗使得阿联与苏联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并在 1959 年 3 月达到白热化程度。<sup>②</sup> 阿联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过来促成了阿联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不过,美国朝野对纳赛尔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相反,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来,开罗与莫斯科的交恶不过是互相争霸的不义之争,即后者的“扩张”触犯了前者的“野心”。这种认识根植于美国人对“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记忆。

1957 年 4 月,《纽约时报》刊文,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统一的期待视作“阿拉

---

<sup>①</sup> Albert Simard, “Evaluating Nasser’s Acts: Moves Declar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Blueprint for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58.

<sup>②</sup> Malik Muf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sserist Pan-Arabism,” pp. 171, 175;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and the Middle East*, pp. 189–192;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哈勒:《美国对阿拉伯统一的态度(1918~2008)》(阿拉伯文),第 329–337 页;[伊拉克]阿里·萨利赫·哈马丹·哈米德:《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从独立到阿以战争(1946~1967)》(阿拉伯文),第 149 页。

伯人长期梦想着恢复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大帝国,(这个帝国)一度从直布罗陀蔓延到古印度”<sup>①</sup>。1958年4月,美国著名记者基鲁斯·苏兹贝格(Cyrus Leo Sulzberger)在《纽约时报》撰文,认为“纳赛尔创建帝国的天赋将在这座深沉的古城(大马士革)得到检验。自从叙利亚女皇芝诺比娅以来,几乎所有的黎凡特君王都必须统一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才能取得非凡成就。萨拉丁实现了,马穆鲁克实现了,后来土耳其人也实现了。这也是纳赛尔的泛阿拉伯运动之本意。”<sup>②</sup>以古代东方帝王的功业比附纳赛尔的“泛阿拉伯运动”,折射出纳赛尔在作者眼中的权力欲望与“他者”身份。苏兹贝格进而认为,穆斯林在阿联的实际地位要高于科普特人、犹太人及基督徒,并非如纳赛尔宣称的那样平等。这一表述强化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伊斯兰色彩,进而从宗教上放大了阿联在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苏兹贝格并没有渲染纳赛尔的亲苏立场,相反还引用了他的反共言论。但即便如此,纳赛尔仍被他描绘成“一位煽动反西方情绪的野心家”。<sup>③</sup>

1958年7月25日,路易斯·卡塞尔(Louis Cassels)在《奥斯汀国务家报》在撰文称,从历史的宏大视角看,当前“中东危机”<sup>④</sup>的关键人物不是纳赛尔,而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因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最为有利的统合因素。卡塞尔指出,“公元732年,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斯山打败他们(穆斯林)对法国的入侵前,西欧似乎注定要成为伊斯兰的一个省。盼望泛阿拉伯统一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听到开罗广播后,一定会回想起这段历史。”<sup>⑤</sup>将穆斯林对欧洲的征服史与“开罗广播”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读者将纳赛尔置于“东西对立”的历史叙事中,认为他会继承当年那些穆斯林哈里发的遗志,继续威胁着欧洲。8月,该文被《芝加哥卫士日报》转载。<sup>⑥</sup>《华尔街日报》的驻外记者雷伊·维克尔(Ray Vicker)也持类似看法,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是消极可怕的,因为它是靠阿拉伯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绪。维克尔还追溯穆斯林的早期历史,即“伊斯兰的精神在7世纪席卷阿拉伯世界时,狂热的穆斯林很容易团结一致对付‘异教

① Farnsworth Fowle, “Freedom Brings Nations No Unity: Old Hope of the Restoration of Mohammed’s Empire Still Only a Dream,”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57.

② C. L. Sulzberger, “Foreign Affairs; Nasser: IV — A Symbol of Disconten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58.

③ Ibid.

④ 指黎巴嫩内部冲突、伊拉克政变、约旦动荡引发的紧张局势。

⑤ Louis Cassels, “Mohammed, Not Nasser, Key Man in Mideast,” *The Austin Statesman*, July 25, 1958.

⑥ “Rising Pan-Arab Tide 2nd in Thousand Years,” *The Chicago Defender*, August 9, 1958.

徒’。”<sup>①</sup>基于这种历史认知产生的焦虑感,已经明显超越冷战的叙事逻辑。

与此同时,美国舆论界开始注意到纳赛尔对苏联的猜忌。有记者指出,纳赛尔虽然拿着苏联的援助,但终究与其不是一路人,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拿任何人的援助,也可以对抗一切妨碍他的人。<sup>②</sup>果然,在伊拉克革命政权的内部斗争中,总理卡塞姆凭借伊拉克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罢黜了亲阿联的副总理阿里夫。这就使得纳赛尔对苏联的态度出现“右转”,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反共姿态。对此,美国媒体予以多次报道,将其归结于纳赛尔建立“阿拉伯帝国”的“野心”在伊拉克遭遇了挑战。<sup>③</sup>

面对纳赛尔反苏的立场转向,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2月,有人在《华盛顿邮报》<sup>④</sup>撰文指出,纳赛尔主义如果真能取代共产党接管中东,固然是两害相权其轻。但纳赛尔对共产党主导伊拉克的厌恶在于,他建立“阿拉伯帝国”的想法遇到了挑战。美国的选择无需局限在纳赛尔和共产党之间,而是应该支持“一个独立的伊拉克”,既不受制于共产党,也不服从纳赛尔。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近东其他国家。<sup>⑤</sup>这篇未署名文章的立场与美国部分政府官员的意见极为契合。<sup>⑥</sup>出于这样的心态,《纽约时报》刊文指责纳赛尔“建立

---

① Ray Vicker, “The Arab ‘Anti’: History Shows a Common Grievance Binds Them Be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9, 1958.

② Osgood Caruthers, “Nasser and Neutr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58.

③ Dana Adamas Schmidt, “Regime Still a Mystery,”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58; “Iraq Foils a Nasser Coup,”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9, 1958; “Setback for Nasse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58; “Nasser’s Campaig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58.

④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⑤ “Nasser as an Alternative,”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December 26, 1958.

⑥ 1959年1月6日,美国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朗特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伊拉克有一个既不被阿联主导、也不被共产党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府”,才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情局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纳赛尔的反共言行,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治利益”,即纳赛尔“对霸权的诉求”,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阵营,只要触犯纳赛尔的影响力就会遭到他的抵制。苏联对伊拉克亲共政策的支持,恰恰威胁了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诉求。4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询问是否存在区别于纳赛尔的“真正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也是既不愿让伊拉克被伊共接管,也不愿伊拉克被阿联控制。除尼克松外,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乔治·艾伦(George Allen)也持同样立场,认为如果将伊拉克交给纳赛尔,纳赛尔就会吞并整个中东。参见“Notes on Discussion of Iraq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M. Rountree, NSC Planning Board Meeting,” January 6, 1959, CK2349563955, *USDDO*; “Nasser and the Pan-Arab Conflict with Communism,” March 2, 1959,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150-002-0299, pp. 5, 10-11, 20;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02n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17, 1959,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Vol. 12, pp. 430-433.

帝国”的企图遭苏联反对后,就妄图在西方的“容忍”下破坏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义务”。<sup>①</sup>可见,美国朝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两雄争霸”的眼光看待纳赛尔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将前者的反共立场转向归结于纳赛尔的个人“野心”,缺乏价值观上的肯定。

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肯尼迪在竞选期间批评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呼吁改善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力量的关系。这一政策立场使得肯尼迪政府一度将美国与阿联的关系带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人警惕纳赛尔的“帝国”。1月19日,民主党前任参议员赫伯特·雷曼(Herbert H. Lehman)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严厉批评政府帮助阿联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指责纳赛尔试图控制非洲,威胁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试图“建立一个巨大的亚非帝国”。值得注意的是,与纳赛尔为敌的阿拉伯国家中,雷曼提到了伊拉克。<sup>②</sup>虽然当时的卡塞姆政府表现出对伊拉克共产党的防范,但总体而言,卡塞姆治下的伊拉克仍是当时最亲苏的阿拉伯国家。

1963年2月8日,被视为亲纳赛尔力量的阿里夫与复兴党发动武装政变,<sup>③</sup>处死了亲苏亲共的卡塞姆以及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萨拉姆·阿德勒等人。3月8日,复兴党又在叙利亚通过政变上台。<sup>④</sup>与伊拉克新政权一样,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反共色彩,同时又带有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伊叙两国的政权更替得到了纳赛尔的热烈欢迎。对于伊叙局势,美国舆论的看法与当年它们看待阿联成立的心态颇为相似。美国媒体一方面注意到纳赛尔与复兴党打击伊叙共产党,并为此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担心伊叙的政权更迭是纳赛尔“帝国扩张”的又一胜利。当然,美国媒体也认识到,在伊叙掌权的复兴党不甘受纳赛尔的摆布,双方矛盾重重。问题在于,美国人即便怀疑纳赛尔是否具有掌控伊叙局势的能力,但却很少有人质疑他呼风唤雨、四处出击的躁动与“野心”。<sup>⑤</sup>从这个意义上说,1963年初的伊叙政权更迭使得纳赛尔在美国舆论中的

<sup>①</sup> “Nasser’s Pir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59.

<sup>②</sup> Herbert H. Lehman, “Warning on U. A. R Role: Domination of New African Group Held Threat to Peace in Are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1961.

<sup>③</sup> 1958年7月,阿卜杜勒·萨拉曼·阿里夫与卡塞姆共同领导了推翻哈希姆王朝的政变。阿里夫成为政权二号人物后不久,便作为亲纳赛尔分子而遭到卡塞姆的清洗,此后又被卡塞姆赦免。

<sup>④</sup> 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宣布独立。纳赛尔虽坚持阿联的国号与国旗,但也被迫承认叙利亚的独立。

<sup>⑤</sup> Dan Kurzman, “Iraq is Scene of Pro-Nasser Cou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63; “Coup in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1963; “Friends & Brothers,” *Time*, February 15, 1963; “Tentative Hopes for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63; “And Now Syria; Help for Nass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63; “Another Nasser Triump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63; “Spreading Infection,” *Time*, March 15, 1963.

“野心家”形象进一步凸显。如同《纽约时报》文章所言,纳赛尔因也门和伊拉克的“革命”又“重新做起了阿拉伯帝国的旧梦”。<sup>①</sup> 也门局势的持续紧张使得部分人认为也门成为中东的“火药桶”,并将阿联和沙特对也门内战的介入视为“地区和平”的威胁,并且更强调纳赛尔的责任。<sup>②</sup> 至 3 月中旬,《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在中东,哪里有动荡,哪里就有纳赛尔”的长篇时评。<sup>③</sup>

此时,纳赛尔政权与复兴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蜜月,双方计划推动阿联、伊拉克及叙利亚组成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统一运动似乎又要迎来新的高潮。这再次唤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历史记忆。1963 年 4 月,《纽约时报》刊文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怀念那个穆斯林帝国占领西班牙的时代,也希望自己再次拥有如此巨大的势力”<sup>④</sup>。追溯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史,很容易让美国读者以敌视的眼光看待纳赛尔追求的“阿拉伯统一”。当月,苏兹贝格以“凤凰”(Phoenix)形容纳赛尔组建的“联邦”正以“更大规模重新出现”。对此,令苏兹贝格担忧的不是纳赛尔“徘徊于冷战敌对阵营间的不结盟政策”,而是以色列所要面临的威胁。苏兹贝格将纳赛尔所怀念的“过去”解读为“阿拉伯人从波斯席卷至大西洋的过去”,再次联系到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征服”的负面记忆。<sup>⑤</sup> 7 月,《纽约时报》发表未署名文章,认为“阿拉伯人激烈的内斗”主要是因为“纳赛尔试图创建一个从大西洋绵延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帝国”,作者认为美国对阿联近 10 亿美元的援助并不能“维护和平”,据此呼吁肯尼迪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事态出现“新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并没有将纳赛尔的“野心”攀附到苏联的身上,反而将“俄国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叛乱”当作对纳赛尔的挑战。<sup>⑥</sup>

纳赛尔与复兴党之间的矛盾使得三国联邦的计划旋即夭折,阿联与叙利亚的关系迅速恶化,俨如敌国。尽管阿拉伯统一运动再次受挫,仍有人相信其深厚的思想基础。11 月,托马斯·柯林斯(Thomas Collins)在《新闻日报》撰文,将阿拉伯统一的理念追溯至伊斯兰教教义,认为“泛阿拉伯团结理念根植于哈里发时代,当时阿拉伯人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如今经历了外国统治的阿拉伯人

① “Nasser’s Empire Drea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63.

② Hanson W. Baldwin, “Yemen -Tinder Box in Middle Eas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63.

③ Dana Adams Schmidt, “In the Mideast, Wherever There Is Turmoil, There Is Nass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63.

④ “New U. A. R Is the Biggest Gain Toward Old Arab Goal of Uni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1963.

⑤ C. L. Sulzberger, “Foreign Affairs: Phoenix in the Arabian Sand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63.

⑥ “The Arab Cockpi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9, 1963.

又把富强之梦寄托在了统一之上。因此,尽管阿拉伯国家间矛盾不断,但“单一阿拉伯国家的理念却很盛行。”<sup>①</sup>

此类“历史记忆”随后有所消沉,但到了纳赛尔晚年再度活跃起来。1969年8月,杰西·李维斯(Jesse W. Lewis, Jr.)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伊斯兰教根源,认为阿拉伯人念念不忘“那个统治地中海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这促成了他们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情绪。<sup>②</sup>也有人认为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并无太多联系,但却指责纳赛尔通过宣传“吉哈德”(圣战),“尝试用宗教狂热的神圣纽带来刺激他的泛阿拉伯主义”。在李维斯看来,纳赛尔的宗教宣传是“完全的复古倒退”(sheer anachronism)。<sup>③</sup>11月,塞伊莫尔·康明斯(Seymour K. Cummins)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开篇即将“泛阿拉伯主义”与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吉哈德”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威胁以色列与非洲基督徒的“扩张主义政策”。<sup>④</sup>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逝世。一周后,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将美国与阿联(埃及)关系的恶化,归结于纳赛尔的“权欲”(megalomania),指责纳赛尔“梦想主导一个从大西洋、地中海直到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还把自己当作了12世纪建立阿拉伯帝国的英雄萨拉丁”。<sup>⑤</sup>

## 五、结语

在国际政治中,相较于权力与利益等现实因素,文化确实鲜有立竿见影的体现,但却有着滴水穿石、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归根结底都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国内政治又与社会心理有着密切联系。舆论通过媒体、国会、智库等媒介,在美国对外行为中发挥着微妙作用。了解美国社会舆论对于中东问题的刻板印象或固化的叙事模式,是把握美国中东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泛阿拉伯主义”的负面刻画,暴露出美国社会舆论根深蒂固

<sup>①</sup> Thomas Collins, “The Arab World: Dream of a Single Nation,” *Newsday*, November 21, 1963.

<sup>②</sup> “Religious Influence Permeates Arab Life,” *The Washington Post, Times Herald*, August 25, 1969; “Islam a Way of Life to Devout Arab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1, 1969.

<sup>③</sup> “Nasser’s Holy War Threat May Boomerang on Him,”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7, 1969.

<sup>④</sup> Seymour K. Cummins, “Jihad and Pan-Arabism,”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69.

<sup>⑤</sup> Jack Anderson, “Megalomania Was Clue to Nasser,” *The Washington Post, Times Herald*, October 4, 1970.

的认知模式。

首先,美国社会舆论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敌视并非始自纳赛尔的亲苏外交,而是延续了西方世界关于“东西对立”的叙事逻辑,继承了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很多学者强调纳赛尔鲜明的世俗主义色彩,同时又注意到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沙特王朝与美国历届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正是因为沙特掌控着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一度令艾森豪威尔政府幻想以沙特的宗教资源对抗纳赛尔政权的影响力。<sup>①</sup> 雅库布也正是以此论证自己的观点:美国与纳赛尔的矛盾是利益之争而非文化与价值观的对立。在国际政治中,利益与文化这两种常被对立起来的因素,往往会形成一股合力。美国朝野对纳赛尔的长期控诉,不仅仅是对其威胁西方利益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西方世界长期盛行的叙事模式与历史记忆。美国舆论总是指责纳赛尔“试图建立阿拉伯帝国”,正是延续着一战以来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污名化叙事,其背后又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伊斯兰教的敌视与恐惧。

早在一战结束的 10 多年间,纳赛尔尚未成年,但“泛阿拉伯主义”已经在美国的舆论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排外”色彩,其表现为对内“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对外仇视欧洲。这种污名化叙事连带着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在“阿拉伯帝国”“穆斯林帝国”“哈里发国”等历史意象的修饰下,“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舆论中表现出浓厚的伊斯兰色彩。至纳赛尔时代,与沙特国王相比,纳赛尔确实没有那么明显的宗教色彩,但他对西方列强和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很容易使其穆斯林的“他者”身份在美国人眼中被放大,进而触动美国人对于“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使得他们对穆斯林的负面记忆与刻板印象在纳赛尔身上得以复苏,联想到昔日那个曾经占领西班牙甚至威胁整个欧洲的“阿拉伯帝国”。

其次,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泛阿拉伯主义”的负面刻画折射出美国社会对于中东地区整合主义的忧虑,并与美国政界抵制“泛阿拉伯主义”的言行相呼应。在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诸国林立的局面下,“帝国”一词本身就带有统合的含义。正是这种地区统合主义倾向激化了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征服”的负面记忆,唤起了西方对于“重建阿拉伯帝国”的恐惧心理。同样以纳赛尔与沙特王朝进行比较,虽然美国朝野总是对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充满非议,但很少抨击沙特的对外政策。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沙特在哈希姆王朝的“泛阿拉伯野心”面前处于守势,在美国人眼中表现出对“地区现状”的维护而非挑战。换句话说,当时沙特王朝的伊斯兰色彩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外溢性和扩张性特征。况且,沙特

---

<sup>①</sup>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and the Middle East*, p. 103.

还长期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而反观纳赛尔在“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下,屡屡介入其他阿拉伯国家事务,积极推行西方语境中的“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人眼中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性与扩张性,成为否定地区秩序与现状的“修正主义者”,伴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

因此,美国舆论对纳赛尔的敌视态度,不会完全取决于开罗与莫斯科的关系。的确,在冷战背景下,纳赛尔的亲苏外交自然会使美国朝野更加敌视他试图建立的“阿拉伯帝国”。但渲染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惧,远早于冷战和纳赛尔时代。即便美国人认识到纳赛尔与苏联出现严重对立,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纳赛尔会“改邪归正”。相反,很多人只是将其视为开罗与莫斯科的“争霸”。在这种“以燕伐燕”的认识模式下,纳赛尔的“阿拉伯帝国”虽然在客观上可能会遏制苏联的扩张,但仍会威胁西方与以色列的安全。

这样的看法也并非孤立的媒体现象,在美国的政界也不乏应和。“阿拉伯帝国”一词甚至被写入1958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文件中。<sup>①</sup>“帝国”字样也经常被美国官员用来形容纳赛尔的野心。例如,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回忆录中就指责纳赛尔的“帝国梦”。<sup>②</sup>即便是在民主党政府中被视作“亲纳赛尔分子”的罗伯特·科默(Robert W. Komer),也不否认纳赛尔是一个“埃及帝国主义者”。<sup>③</sup>如果说“帝国”字样只是被政府决策者用来形容纳赛尔的“地区野心”,没有连带太多的历史记忆,那么该词在美国国会中就是另外一番场景。1958年9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谈及加纳问题时,列席的新闻大亨亨利·鲁思(Henry Luce)表示,有人将“伊斯兰与纳赛尔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反西方、反民主的伊斯兰纳赛尔主义”<sup>④</sup>。作为反纳赛尔中坚力量的参议员恩尼斯特·格鲁宁(Ernest Gruening),在1963年10月呈递给参议院的报告中为渲染纳赛尔的威胁,引用了海明威前妻、著名媒体作家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一句话:“一千年的穆斯林帝国(Muslim Reich),埃及统治的非洲大陆,可能是一个迷梦,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迷梦以及做这样梦的人……希特勒的

<sup>①</sup>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January 24,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Vol. 12, p. 20.

<sup>②</sup> Lyndon B.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290.

<sup>③</sup> “Memorandum for Record by Komer,” January 29, 1963, SC5000017936, Database: *Archives Unbound*, Gale Group, Inc.

<sup>④</sup> “Stud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7, 1958, *ProQuest Congressional*, HRG-1958-FOR-009, p. 209.

声音回荡在这片土地,只不过现在说的是阿拉伯语。”<sup>①</sup>可见,美国舆论界对“阿拉伯帝国”的负面认知,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美国政界抵制“泛阿拉伯主义”的行为形成了呼应。

最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伊斯兰征服”的负面记忆以及对地区整合主义的忧虑,并没有因“泛阿拉伯主义”的没落而消失,而是延续至今天美国社会的舆论当中。虽然“泛阿拉伯主义”不再是高频词汇,但近年来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和巴尔干地区事务的介入,以及与穆兄会的互动合作,又唤起了很多美国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又回想起另一个让欧洲惶恐不安的“伊斯兰帝国”。2016年4月,在美国国会众议员的讨论中,共和党众议员路易·戈莫特(Louie Gohmert)指责埃及穆兄会代表的“激进伊斯兰分子”试图“仿造过去的奥斯曼帝国,即那个席卷北非、地中海的哈里发国……将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戈莫特庆幸埃及穆尔西的倒台,称“这个哈里发国在北非与叙利亚站稳脚跟前,被埃及人民终结了”。<sup>②</sup>美国媒体更是频繁追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与欧洲的“压迫与威胁”。2020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刊文指责埃尔多安“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大搞军事冒险”,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并将埃尔多安政府的行为,附会到奥斯曼苏丹谢里姆一世“对中东及地中海东部的主导”。在文章作者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看来,“重建类似于谢里姆那样的霸业,对土耳其、中东乃至全世界都是危险的”<sup>③</sup>。可见,美国舆论对于“伊斯兰征服”的历史记忆,仍然连带着对中东地区内部整合的忧虑。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包澄章)

---

① “Report of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in Ten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Countries,” October 1, 1963, *ProQuest Congressional*, CMP-1963-OPS-0008, p. 423.

②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14<sup>th</sup>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21, 2016, *Hein Online*, pp. H1916-H1917.

③ Alan Mikhail, “Why Recep Tayyip Erdogan’s Love Affair with the Ottoman Empire Should Worry the World?,” *Time*, September 3, 2020.